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
SHANGHAI DEVELOPMENT RESEARCH FOUNDATION



卓越·发展研究院
Excellence Academy of Development Research

SDRF-EADR 通讯 第 57 期

2014年我国的外交

吴建民

原中国驻法国大使

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2015年1月8日

上海新锦江大酒店

2014年我国的外交

乔依德（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卓越发展研究院院长）：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原驻法国大使吴建民先生给我们做主题演讲。吴大使现在是国家创新和发展战略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他对我国的外交工作及外交战略有很深的造诣，而且在上海办世博会的时候，吴大使是国际展览局的负责人，为上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今天的演讲题目是“2014年我国的外交”，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吴大使给我们做演讲。

吴建民：谢谢乔秘书长的夸赞，实在不敢当。今天我非常高兴跟大家分享。我刚才得知这次沙龙是第101次。在法国，有一次我问他们，你们沙龙是怎么开展起来？他们就跟我讲了一个故事，法国在封建王朝的时候，贵夫人举办下午茶或者请吃饭，都在沙龙里面。沙龙这两个字法文是“大客厅里面”。他们告诉我，沙龙对于法国和欧洲的启蒙运动，贡献很大。因为当时的统治非常严厉，但是在沙龙里面言论很自由，各界人士在这里聚会分享，于是产生了好思想。马克思也对启蒙运动评价很高。启蒙运动是人类历史上第二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没有这个运动，这个世界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所以你们在上海搞这个沙龙，我很高兴来和大家分享。

2014年结束了，我们在回顾2014年的时候，可能需要从这一年发生的事情当中来吸取教益。我认为这一年是难忘的，有很多的教益值得我们汲取。为什么是难忘的？2014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00周年，甲午海战120周年。在2014年来临之前，2013年，欧洲就传出一种声音，说2014年和1914年很相象，这话是很吓人的。因为1914年之前，当时的欧洲，包括英国和德国之间，经贸来往非常频繁，也不会想到打仗。当时英国的一个作家诺曼写了一本书，里面一个基本的观点是：经贸往来如此频繁，战争不需要打。但是战争还是爆发了。说1914年和2014年很相象，这个话的潜台词很吓人，又赶上甲午海战120周年，这一讲，我觉得有一种现象——不知道你们观察到没有——就是思潮。我今天在复旦大学聊天，他们问我，我们现在国家发展很快，外交也搞得很好，有什么不足？我说研究思潮研究的不够。这股大讲战争的思潮，特别是安倍去年1月22号讲今天的中日关系和当年的英德关系很像，各种媒体就跟着讲，然后形成了一种舆论：东亚地区是全球最危险的地区。我不知道这种舆论，中国人听到有什么感觉？当时很奇怪，为什么就跟着讲起来了呢？说东亚这个地方最危险，对你有什么好处？这是一股潮流。所以形成这个东西之后，全国很多地方请我去讲话，他们竟然问我，吴大使，是不是要打仗了？对越自卫反击战之后，这是第一次我被问是不是要打仗了。军队的人告诉我，因为这个舆论趋势，去年征兵都有点困难。我想去年这种氛围是自改革开放以来，谈战争最为狂热、疯狂的一年。大家都生活在这

种现象里面,包括电视台上一些军事专家都在讲打起来怎么样,双方武器怎么样,好像战争一触即发,箭在弦上。我看到这个现象,心里很不舒服。

欧洲那些人说要打仗,到了年底都错了。什么原因?因为他们不懂亚洲。我们中国人是不是也应该对去年的形势进行反思,看能得出何种启示?我想有三条启示。

第一条启示,邓小平同志发现了时代主题的变化。1980年代初,他反复讲一个观点:当今世界面临两大问题,一个和平,一个发展,两大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这个观点在当时提出,是了不起的变化。因为在改革开放之前,毛主席挥不去的忧虑就是战争,准备打仗,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今天的人听这几句话,像耳边风一样过去了。我们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知道这九个字。因为那是战争与革命的时代,按照列宁1916年的论断,那个时代是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主题是战争与革命。邓小平后来发现,时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现在这句话因为讲多了,变成套话了。我在大学里面讲,千万不要把这个当成套话。时代主题是什么含义?就是一个时代,当时的世界面临各式各样的问题,时代主题指出了解决世界的大问题的途径。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谈判是没有用的,比如日本人打来了,怎么办?打出去啊,没有别的办法。再比如中国专制统治,改良都失败了,毛主席领导革命,成功了,这就是时代主题。

今天是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什么意思?今天世界面临的问题,依靠战争解决不了。进入21世纪,美国打了两场半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打的什么结果?911十周年前夕,华盛顿邮报驻北京记者跑到我办公室采访我,了解911十周年中国人有什么反应。他坐在我办公室,第一句话就是:吴大使,你们这十年,发展得多好。这个话很对。下面一句话,我们美国人就顾打仗了。再下面一句话,中国是911的最大受益者。我一句句评论他。我说,你说中国发展得很好,很对。2001年的时候中国的GDP是1.15万亿美元,2011年的时候大概是7.5万亿美元;2001年美国GDP差不多10万亿美元,到了2011年时候是15万亿美元。原来美国是我们的8倍,到了这个时候,是我们的一倍左右。他下一句话,你们是911最大受益者。我说我不同意你这句话,我说是你们逆了和平发展共赢的世界潮流,我们顺了这个潮流,不是现在,而是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就顺了这股潮流。

不就是这样吗?有的研究国际问题的人说,乌克兰危机一出现,又为中国赢得了10年战略机遇期。我去年年底参加一些会议,俄罗斯人也讲,乌克兰危机,中国是最大受益者。我说我听了这个话,很不舒服。我们怎么成为最大受益者?我们只是顺了这股潮流,关键是在这里。人家倒霉了,中国就好了?反过来,有一天人家好了,中国是不是就要倒霉呢?时代的主题是无法逆转的,我们顺应,就发展得好。战争还能解决问题吗?人类历史上多少年,国与国之间发生争端,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不了的就通过打仗,打仗的后果双方也认了,多少年都是这样。甲午海战打完以后,割地、赔款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我们把台湾澎湖列岛割出来了,赔了两亿两白银,一开始日本准备把辽东半岛割出去,结果这个消息一发

布，列强向日本人抗议，日本人被迫说，辽东半岛不割了，再多赔 3 千万两白银。最后我们赔了 2 亿 3 千万两白银，相当于他们七年的预算，日本占了大便宜啊。所以在那个时候，割地赔款和不平等条约是惯例。21 世纪，美国打了这几场战争，阿富汗矿产资源非常丰富，喀布尔是全球第三大铜矿，美国人敢说都是我的？打了伊拉克，伊拉克的石油资源全球储量第三，美国人敢说石油都给我？还有利比亚，敢吗？不敢啊。这个世界变了。

去年一年很多人讲，钓鱼岛打一仗，就可以解决问题。能解决问题吗？这是不懂时代主题。邓小平应该是最懂得战争的，他打了一辈子仗。当年看他的文选，我在考虑一个问题，他说，国际争端不能通过武力的办法解决，南海诸岛，包括钓鱼岛，搁置争议，共同开发。邓小平不懂得通过战争把领土夺回来？他比谁都懂。但是他了不起的地方，是看到时代主题变了。这就是我们汉书两句话，《汉书·董仲舒传》里有，“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道，就是反应事物规律的东西，它之所以很大，就是源于天——大的环境，天不变，道亦不变。时代主题变了，是天变了，道也得变。有些人鼓吹打一场战争就能解决问题，实际根本不能解决问题。

我想请你们注意，习近平同志就任总书记之后，多次引用孙中山先生的那句话，“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去年年底，我去了中山故居，中山故居馆长告诉我说，习近平引用这个话，引用了七次。这是中山先生的至理名言，在 1916 年 9 月 16 号，他到浙江海宁看钱塘江大潮，大潮涌来，汹涌澎湃。中山先生这时候 50 岁，他看到钱塘江大潮，结合他对世界的观察，对中国的观察，提出这句话，太有道理了。所以潮流不能逆。中央很清楚。APEC 会议开得很好，习主席和奥巴马谈得很好。习主席见安倍，当时板着脸，最后谈得还可以，能达成四点共识很简单。四点共识我们可以看得清楚，中国人该坚持的原则都坚持了。整个舆论对中国外交的反应是很好的。战争的狂热减退了。这种狂热错在什么地方？错在不懂得时代潮流，还停留在战争革命时代，以为战争能解决问题。最后，中央为什么要和日本人谈？按照那时候说法，不应该跟他谈，打起来才好呢。那行吗？我觉得第一个给我们的启示是，时代主题的变化是国际关系中最大的变化，属于天的变化，道也跟着变，过去的道，战争能解决问题，那已经过去了。美国人打仗都不解决问题，中国人为什么还跟着？2013 年 10 月 1-16 日，美国政府关门 16 天，没有钱了。第一超级大国，怎么没有钱了？因为债务达到上限 16.7 万亿美元，如果再往上提，要国会开会通过。共和党控制国会，不批准，所以美国政府关门 16 天。美国如果不打这两场战争，那应当好过很多，两场战争花多少钱？美国人自己讲是 6 万亿美元。打仗不解决问题，打仗之后碰了南墙，中国人还跟着撞南墙吗？这是非常重要的启示，就是要顺应潮流，潮流不能逆。

第二条启示，要胸有全局。要把世界放在心里来看。去年 12 月 8 号，首尔开了一个全球会议——世界政策会议，由法国人发起的。美国人去了对外关系委员会的主席。法国谁去的？这个人我认识，他当过密特朗、希拉克、萨克奇三任总统的外事顾问，被称为法国的金牌外交家，是国际关系界公认的大家。第一场会，

我坐在下面的，他们讲欧亚的安全形势，两个人差不多一个调子。美国人说，亚洲有领土争端，欧洲没有领土争端，欧洲有安全机制，亚洲没有安全机制，结论是亚洲比欧洲危险。法国发言人当过三任总统的外事顾问，法国的外事顾问相当于美国的总统国家安全助理，在法国地位很高，然后又当过驻联合国大使、驻美国大使，外交上最重要的职务他全干过。他在会议上发表一个观点，现在亚洲的问题，出现了新门罗主义。影射谁呢？影射习近平主席去年在亚信峰会的时候有一句话，亚洲的事务归根结底要由亚洲人拿主意。他们说，这是新版的门罗主义出来了。

会场上我一看，当时我几乎是唯一的中国人，他讲完之后，我就举手了。我这样驳斥他们：你们看问题，就局限在一个点上，世界全局你们要不要看，世界全局是什么？世界全局有三个中心。第一个中心，就是局部战争、冲突、仇恨的中心在中东和北非。现在伊拉克战争，叙利亚打得一塌糊涂，全球大国在这里争夺，地区大国在这里搅局。教派冲突，什叶派和逊尼派仇杀，伊斯兰教里的两大教派仇杀起来很残酷。阿拉伯、以色列冲突在这里延续。全世界各种矛盾集中爆发地在中东北非地区，这个地区吸引了国际社会外交上的注意。因为这个地区动荡，又是全球石油出口量最大的地方和油气资源最丰富的地方。在全球化的今天，有这样一个中心还不够吗？

第二个中心，全球金融危机的中心在欧洲。我最近几年，几乎年年去欧洲，感觉欧洲人对前途相当悲观。2014年11月9号，我参加在柏林开的一个研讨会，戈尔巴乔夫讲了一篇话，他是会议的主席，讲欧洲形势，大家都很悲观。冷战结束25年了，看样子新冷战要爆发了。欧洲的经济情况不太好，美国复苏的势头还可以。2008年危机是从美国爆发的，但后来转移到欧洲，为什么转移到欧洲？因为欧洲爆发了主权债务危机。我现在退休之后，参加很多国际会议，和欧洲政界人士接触很多，我问他们怎么会爆发危机？他们说欧洲代议民主制度陷入了危机，主权债务危机是制度造成的。原来欧共体，后来的欧盟，有一个《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每年政府的预算赤字不能超过3%，公共债务总量不能超过GDP的60%，这很好。但是主权债务危机一爆发，大家发现很多政府都超过了这个规定。因为竞选的时候，各方政客、政党领袖要选民投票，就允诺上台后给大家办什么好事，上台之后，发现没有那么多钱，怎么办？借债，反正在台上就四、五年，还债是后人的事情。所以金融危机就转移到欧洲去了。你看现在欧洲领导人的注意力向内转了，欧洲原来在国际舞台上是很活跃的，但是现在大部分精力是搞欧洲内部的事。最近希腊又出问题，反对党如果上台，就可能退出欧元区，欧元区议论纷纷。

第三个中心，全球经济增长的中心在亚洲，特别是东亚。过去几十年，东亚这块地方，包括中国在内，发展最快最有活力，这个地方拉动了全球GDP的增长。

你把这三个中心联系起来看，会得出什么结论？第一个结论，就是亚洲地区，特别是东亚地区，是全球经济增长中心，东亚没有一个国家想破坏这个地位。这不是发疯吗？我想没有一个国家不珍惜这个地位。第二，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

没有一个大国，没有一个国家集团，把破坏亚洲为全球经济增长中心的地位作为自己的政策。为什么？亚洲的增长是全球的需要。美国要进一步克服危机造成的影响，要靠经济增长；欧洲要摆脱危机的阴影，要靠经济增长；全球现在 28 亿穷人贫，要靠经济增长，这是一个明摆着的事实。把亚洲的增长势头打断，对谁都没有好处。第三个结论是什么？我们亚洲，特别是中国，面临的战略机遇期依然存在。中央做的论断是，21 世纪头 20 年，乃至更长的时间，是中国的战略机遇期。

我在会上讲了这三条后，我就问美国人，你说亚洲比欧洲危险，我们亚洲这个地方是有紧张，但是没有打起来，欧洲打起来了，乌克兰那里尽管规模不大，但是打起来了。他一句话没有说，虽然这些人都能言善辩，而且用英文来辩论，但是他却说不出。我又针对法国人提问：你说出现亚洲出现新门罗主义，我说你犯了时代的错误。门罗主义是什么时候？是 19 世纪上半叶，今天是什么时候？是 21 世纪。19 世纪是列强瓜分世界的时候。今天是什么时候？是相互依存的时候。他也说不出。所以我说，这三个中心要全局看，胸有全局，才能看清局部。

第三条启示，中国人现在一定要明确，我们最大的利益是什么。去年 11 月 19 号，刘云山同志在中南海召集会议，我也去了，他叫我们对外事工作提点意见。我在会上讲了一个观点，我说我们的外交工作，一定要围绕中国最大的利益。21 世纪中国最大的利益是什么？明确了这个，其他就好办，大道理是和大利益联系在一起的。中国最大的利益是什么？邓小平做了论断，发展是硬道理。21 世纪，就是要保持发展的势头。我们大概是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出现这么好的势头。保持这个发展势头，是我们的最大利益。保持发展势头意味着什么？必须保持开放的势头，中国一关门，就完了。

在座的诸位，我讲一点看法，我觉得我们不能低估封闭的惯性。每个人都生活在惯性之中，因为惯性是多年形成的，不知不觉的。中国有这种封闭的惯性。按照邓小平的说法，在明成祖之后，中国走向了封闭。明成祖在位是 1402 年到 1424 年，中国封闭了快 600 年了，这 30 多年开放是新的事情，600 年比 30 年，600 年会形成一种更为强大的惯性。为什么封闭？封闭可以讲出 100 条好处，封闭好控制，封闭有助于稳定，封闭之后外来力量难以渗透等等。这些观点，改革开放初期都批过，今天有些人思想有回潮，说封闭好。但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央明确讲了，开放后苍蝇蚊子会进来，但是新鲜空气也进来了。但是为了封闭，有时候会出现一种舆论，就是夸大外来威胁。你看去年讲日本军国主义，好像就要复活了。我到美国去，见了鲍威尔，这个人很有本事，第一次海湾战争时他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打得好，见好就收。1989 年 7 月，老布什派他到中国来，然后 12 月又来一次，小平同志亲自跟他谈。鲍威尔跟我说，你们讲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你们没有搞清楚军国主义是什么意思？日本军国主义当道的时候，军事占预算的 80%，军人说了算；日本现在的军事预算不到 1%，你说它复活了？这个是有问题。关起门来讲，我们现在军事开支大概是日本 3 倍，我们军队 200 多万人，它才 20 多万人，他能打中国？我认为，必须把这两个分清楚：第一，全世界军队都

要准备打仗，都要应付最坏的可能性，这是一回事。第二，我们对国家面临的安全形势要客观估计，实事求是。不要把这两个混在一起。回过头来讲，中国最大的利益是保持发展的势头，要保持发展的势头必须保持开放的势头，保持对外合作的势头，如果中国对外合作的势头中断了，对不起，我们这个发展的势头就中断了。

我觉得中央对这个非常清楚，历代领导人都有自己的表述。邓小平、江泽民说，和平发展是时代的潮流；胡锦涛加了一个合作的时代潮流，就是作的时代潮流，就是习近平主席说和平发展合作；习近平主席说，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是我们时代的潮流。共赢这两个字出现在中国领导人的讲话中，没有很长的历史。据我记忆，第一次是在1999年11月15号，中美两国达成了中国加入WTO双边协议时，江主席非常高兴，会见双方谈判代表时使用了这个词语，现在共赢用的很多了。我前不久还见到WTO美方首席代表，他说我一辈子干成最大的事，就是和中国谈成了这个东西，中国加入WTO很了不起，这肯定是一个共赢的协议。龙永图在现场，他后来跟我们聊天，我们两个人在上世纪70年代就认识了，都在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他管经济，我在安理会。龙永图说，江主席讲共赢，我太高兴了。我说你干嘛这么高兴？他说吴大使你不知道，加入WTO最困难的谈判，不是跟外国人谈，是跟中国人谈，涉及到各个部门的利益，他们从维护部门利益出发，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帽子很大。有一次谈判中美国人做了一点让步，龙永图提出是不是我们也让一点，实现共赢？龙永图共赢，中方一位领导马上严肃起来，拉长了脸，很严肃的对龙永图说：龙部长，我们和美帝国主义能共赢吗？这句话很厉害。现在江泽民也讲了，他不好批判了。但是想想，时代不变化，能共赢吗？战场上能共赢吗？革命能共赢吗？不可能，时代主题变化了，才能共赢。

中央很清楚，发展是硬道理，保持发展势头是中华民族在21世纪最大的利益，其他都是第二位的。我在APEC会议前后去了国外好几次，大家对 中国外交，到了年底的反应相当好，美国人甚至说，你们和奥巴马谈得这么好，出乎意料。过去有各式各样的批评，这次很好。回过头来看，还是要跟上中央的步伐，跟上小平的步伐，跟上习主席的步伐。我们要摆脱惯性思维，以前几十年以阶级斗争为纲，改革开放之后，我们还要清理以阶级斗争为纲给我们带来的影响。

2014年这一年，给我们启示是深刻的。王毅同志讲了，2014年是中国外交丰硕的一年。这个话我觉得不过分。看各个领域，大国外交成果丰富，周边关系降温了。习主席提出一个口号，很正确，结伴不结盟。我们现在正在编织一切伙伴关系网，和中国有战略伙伴关系的61国，和中国有合作伙伴关系的17国，加起来78国，伙伴关系网很厉害。我的看法是，中国正面临一个大潮的前夜。前不久我跟赵启正聊天，他说中国企业面临第二次大的生长期，就是走向世界。在座有些是企业家，我希望你们看准这个趋势，今天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很好的机会。第一，我们有钱了。1978年，我们外汇是多少？才1.7亿美元。现在光国家的外汇储备就将近4万亿了，还不算老百姓的。第二，世界的需要。第三，中国发展的需要。我们现在的发展是了不起的，但代价是很大的。有一位民营大企业家，

到拉丁美洲购买土地。他跟我讲，中国租一亩土地，一年的代价是 1200 人民币；到拉丁美洲买断一亩地，是 3600 人民币。我们不休耕，田不断地在耕，地的腐殖质很低，只有 0.1%。褚时建改良土壤，花了很大的力气，腐殖质增加了，变成 3%。拉丁美洲的地特别，一般腐殖质 7%到 8%，好的地是 15%。我们公布说，我们农耕地 20%被污染，那个地种出来的东西还能吃吗？我有点怀疑。中国的出路就是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用起来，中国关起门来就完了，中国的发展也是一样。今天世界需要中国的资金，中国企业走向世界是非常好的机会。

当然，走向世界要有好的理念。你们听说没有？有一个华坚集团，做鞋的，在埃塞俄比亚非常成功。是怎么一个过程呢？2010 年，当时世界银行副行长林毅夫见埃塞俄比亚总理时说，埃塞俄比亚需要的是引进劳动密集型而不是高精尖的东西，那个总理听进去了。2011 年，他去了深圳大运会，他跟汪洋讲，你能不能给我推荐一个劳动密集型的业公司？汪洋就推荐了华坚集团。民营企业动作很快，10 月份，老总张华荣就带人去埃塞俄比亚考察，然后带回 80 人来中国培训。2012 年 1 月份工厂投产了，2012 年 3 月埃塞俄比亚造的鞋到了美国市场，美国人弄不清楚怎么埃塞俄比亚出口鞋到我们这里来了。听说那里去年是埃塞俄比亚出口最大的企业，工资只有中国工人的八分之一。华坚是两头在外，很多半成品从这里运去，然后在那里组装，市场也在外面，做得很成功。张华荣 1958 年生，当过兵。他总结经验说：以人为本，服务人类。我很钦佩。我的看法是，中国人走向世界，光讲爱国主义不够，要爱祖国，还有爱人类。中国走向世界，没有一个好的观念不行。中国人走向世界，要高举服务人类，就是习主席讲的共赢。千万不要低估共赢这两个字的分量，共赢这两个字是新生事物，几千年的人类历史都是零和游戏，我胜你败，我赢你输，我得你失。今天世界变了，共赢是非常强大的武器，也是非常重要的方针。当然，公司也得盈利，不盈利就死亡了，为你公司盈利，为当地老百姓谋福利，你就能够经久不衰。我就讲到这里。你们诸位如果有什么问题，我愿意回答。谢谢大家。

乔依德：非常感谢吴大使给我们做的精采演讲。他从我们国家 2014 年外交工作当中，总结了三条启示。第一，我们应该顺应历史的潮流；第二，要胸有全局；第三，我们要明确中国最大的利益是什么。他讲的非常好，非常清楚。下面是提问或讨论时间，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举手。

乔军华：吴大使，我想请教一个问题。你刚才也提到了，开放符合我们中国最大的利益。但是为什么我们现在感觉到互联网的管制好像变得更加厉害了？以前上 Google，后来 Google 退出之后，我们上香港的 Google，现在香港好像也很难上了。

吴建民：互联网是一个新鲜事物，得管，究竟如何管，有什么规则，这是国际上大家都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我想，既然是一个新生事物，人们适应它，管

理它，可能需要一个过程。我没有跟政府具体讨论过，但是政府肯定考虑过这些问题，是不是妨碍安全、稳定，有个权衡，孰轻孰重，要做出一个选择。这个选择是不是完全合理？我说不清楚。但是我觉得，保持发展势头是中国最大的利益，用这个来讲的话，用小平同志在南巡讲话里的三个有利于去处理，有些问题处理起来的方法或者方式，可能有一定变化。现在美国人跟我们谈，说我们盗窃他的商业机密，我们也回应，双方就谈起来了。但 2014 年，美国起诉我们上海的五名现役军人，就走向对抗，就停下来了。去年 12 月份，在中央党校和美方对话的过程当中，他们也提出希望恢复。我就说，希望你们创造条件，我说还是对话比对抗好。不过我想这肯定会出现一个探索适应的过程。说白了，可能对我们所处的安全形势，要有一个全面的估计，这还是很重要的。在座的诸位，你们都有点影响，可以通过自己的渠道，把有些真实的情况向上面反映。

王勇坚：吴大使你好，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日本人与我们国家的关系也很重要，特别是最近安倍重新上台，我想请你预测一下今后中日两国的国家关系的发展走势。谢谢。

吴建民：预测走势很困难，只能讲大的趋势。大的趋势是什么？说到底，怎么看中日两国之间的共同利益和分歧。我认为共同利益是大于分歧的。中美两国，从邓小平到习近平，一直都说，中美之间有分歧，也有共同利益，但是我们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这是一个事实。安倍上台之后，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最大的问题是经济。安倍的三支箭，前两支箭还有些效果，第三支箭的作用好像不是很明显，去年日本经济又陷入了衰退。中国是日本最大贸易伙伴，怎么办呢？中国何尝不需要日本呢？我们现在一些短板，都是日本的长项，比如治理空气污染，它很有办法。另外就是对比中日间的贸易，2005 年紧张的时候，中日搞贸易战，究竟谁吃亏大？2005 年，我们经济总量还比它小，双方都吃亏，一定要说谁吃亏更大，可能是我们更大一点。现在来看，我们出口到它那里去的都是在价值链比较低端的，它出口到中国的都是高精尖的东西，你能都不要它吗？再想一个问题，为什么去年 11 月 10 号，习近平要会见安倍？为什么安倍一定想见呢？双方都觉得关系再坏下去，对双方都没有好处，走到一起来是共同利益的需要。而且我们的方针不是要跟它打仗，现在双方分歧管控也谈起来了。2012 年之前，两国军方已经达成协议，后来由于钓鱼岛国有化就对抗了。现在双方谈管控分歧，防止擦枪走火，擦枪走火对双方都没有好处。小泉纯一郎在任上的几年，两国关系比较僵。我们现在从 2012 年到现在，两年了，这次比上次僵的还厉害。以后当然会有一些摩擦，但是我觉得，决定两国关系的是两国之间共同利益的多寡。我认为历史问题的扯皮可能会长期存在，这也是历史形成的。但是，习近平主席去年 9 月 3 号的讲话非常清楚，历史不能忘记，仇恨不能延续。不能把当年日本人对我们做的坏事，都算在现在日本人身上，这个没有道理，那是他们先辈、军国主义干的事情，这是当时的情况。历史问题的解决还要有很长时间。习主席讲话，还是

要高举世代友好，任何时候民间的工作不能放松。两国友好相处，这是我们国家利益的需要，也是日本利益的需要。再回头看，我们当年处理日本关系的时候，有利机会我们没有抓住，日本出现过舆论，就是脱欧入亚。那时候鸠山由纪夫在台上的时候，小泽一郎带了100多个议员到中国来，当时美国很紧张，不过机会没有抓住。我想中央的方针是保持中日世代友好，这既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也能够赢得人心，还能孤立一小撮右翼分子。中央依然是这个方针。当年毛主席开始，周总理、廖承志、陈毅，做日本工作做得多好，1972年邦交正常化的时候，日本老百姓的民意测验，多数支持邦交正常化。现在因为各种原因，日本方面对中国恶感上升了。但民意是可以引导的，民意不是一成不变的，特别是要做日本民间的工作，做日本企业的工作，日本企业界还是愿意发展中日关系的。

王颐：吴大使你好。习主席去加州，包括奥巴马来北京，都谈到新型大国关系。能不能请你讲一下，新型大国关系怎么理解？新在哪里？

吴建民：新型大国关系，习主席定义了三句话，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这三句话怎么解释？不冲突、不对抗，反应的是两国政府的政治意愿。因为哈佛大学有个教授研究了新型大国的15个案例，11个走向了战争，只有四个没有，所以他说，中美会不会重蹈昔日走向战争的情况？两位领导人说，不冲突不对抗，就是说我们不走战争的路。相互尊重是基础，不要说国与国之间，人和人之间，也要相互尊重。你们都有孩子，小孩也要尊重，和小孩的矛盾很多是由于大人不尊重孩子。小孩都有自尊心，国家何尝不是呢？合作共赢是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途径，过去30多年，就是这样过来的。1971年中美贸易500万美元，2013年是5200亿美元，谁想到发展这么快，为什么？是共同利益，合作共赢的结果。30多年证明这条路能够走得通。去年我们在中央党校举行对话的时候，习主席讲的新型大国关系的道理，美国方面有些人是认同的，有些人还有疑虑。但是我觉得这是中美两国所能够走的唯一符合双边利益的、符合世界利益的道路。我去年10月份到美国，基辛格请我们吃饭，他说美国哪怕是最好战的右翼集团也没有一个提出要和中国打仗，代价太大了。他说这一点你们得相信。我相信。从二战结束45年到现在，大国之间69年不打仗了。我看大国领导人，没有一个敢下这个决心。谁要下这个决心，不管是谁，就会被推上人类的审判台，谁要这么干起来，将来人类饶不了他。所以到现在，69年不打了，如果100年不打，还能打吗？可能性更小了，不能说完全没有。所以我觉得习主席提出新型大国关系，这是必由之路，现在，美国人有点疑虑。我去年10月份和美国民主党的智库谈，我跟他讲新型大国关系，他说：美国人有这个看法，你们的新型大国关系是不是给我们吃安眠药啊？等我们醒来之后，你不知道走到什么地方去了。他们有些疑虑。但我们要用实践，用中美关系踏踏实实向前走的实践来消除疑虑。奥巴马中期选举之后，共和党控制参众两院。奥巴马见习主席，最后一句话是我只剩下两年了。习主席回答说，两年也能做不少事。把中美关系搞好很重要，这对大局是

有关系的。

乔依德：我有几个问题，最近网上看到汪洋在芝加哥的会议上有个讲话，大概意思是中美是重要的经济伙伴，现在规则是美国制定的，中国没有意愿和能力挑战美国，中国愿意在现在的国际经济中发挥建设性作用。我不知道这个话是有还是没有。如果有，为什么报纸上看不到？

吴建民：我没有跟他去，我也没有看外交部的报道来核实是不是有讲刚才这个话。我估计这个话有可能讲过。因为规则是西方制定的，这是事实。当今世界的规则是西方制定的，中国在规则中总体是受益的，我们 30 多年大发展就是这样。从中央开始讲这个问题时，都说我们是现行世界秩序的受益者。当然，现行秩序是西方定的，有些地方不够公正，应该慢慢通过改良的办法，逐渐调整。

嘉宾：吴大使你好，我有一个问题。前两天，在法国发生了伊斯兰极端恐怖主义分子杀害无辜平民的事件，过两天之后，各国领导人在巴黎街头游行支持法国打击恐怖主义分子。但是新疆伊斯兰恐怖分子杀害我们很多无辜群众，但是在国际上面，没有像支持法国那样支持我们，你认为这里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吴建民：我想，第一，这件事情网上都可以看得见，这 12 个人就这么被打死了，而且打死的都是记者。对于西方世界来讲，杀记者被认为是破坏新闻自由，这对他们来讲是一条底线，所以全世界反应那么强烈。中国的情况呢，滥杀无辜是相同的，但不是到一个报社把记者都杀了，全球的反应会有不同。第二，他们对我们的报道是有怀疑的，他们不相信我们说的，他们相信他们自己的报道。有些事情发生，他们没有人在这场，我们讲了这个事情，他们就有怀疑。但是在昆明火车站的杀人事件，国际上反应是比较强烈的。我在新闻司工作过，中国对外国媒体采取一点行动之后，外国的反应特别强烈，我们这一点可能和他们的认识不大一样。各国体制不一样，法律不一样，做法不一样，看法出现差异是必然的。还有不能不承认的，今天世界主流媒体是西方在控制，你说它的舆论完全客观，我才不相信呢。2014 年我参加一个规模不大的国际会议，碰到法国一个老资格的记者，他是法国世界报的名记者，他说在法国讲真话是困难的，有时候同事会觉得讲真话是你同事的威胁。西方新闻那么自由，也有很多问题。但这是它多年形成的一种观念。

高宏：我提一个小问题。我们国家说是海洋大国。你在法国做大使，法国的帆船运动非常发达，我们国家在过去几年里，帆船运动也开始发展。我今天提出的问题，不知道能不能引起你的注意，帆船运动在我们国家发展，在我看来最大的障碍就是政府。帆船运动员都知道，九龙治水，国家各部门之间有很多非常滑稽、不可思议、匪夷所思的一些规定。船进到一个港口参加比赛，到下一个码头

去都不许，全都在三亚一个地方，这真的限制了帆船运动的发展。从发展体育运动、体育产业来看，真是不好，我想借这个机会，引起你的注意，国家有没有可能做一些改进？

吴建民：随便讲一句，汪潮涌在帆船运动方面是很积极的，他参加了不少帆船运动，在世界上为中国赢得了一些荣誉。你想想看，中国开放才 30 多年，我们旧的东西都搞光了？差的远呢。中国三大惯性制约着中国生产力的发展，第一大惯性，几千年封建的惯性，这很厉害，虽然是反帝反封建，但是现在中国社会里面还有很多残余。第二大惯性，封闭的惯性。第三大惯性，革命的惯性。鸦片战争以来，很多都是革命的做法。现在由革命党变成执政党，是很大的变化。但是现在来看，由革命党到执政党转折的过程并没有完成，往往用革命的办法处理执政的问题，这样的例子很多。我自己观察我们社会，中国人必须警惕这三大惯性，我们改革开放，就是破除了一定的三大惯性，往前走了。中国继续往前走，要继续摆脱三大惯性的影响。

乔依德：我把吴大使在凤凰台和别人辩论的视频，调出来看了，看了以后，我深受启发，同时也有问题，我趁这个机会问一下。第一，你辩论了以后，对这个辩论怎么看？我个人看了后，我赞同你的基本观点，包括你今天讲的。但是使我最吃惊的，并不是跟你辩论的人，他的观点我们也清楚。最使我吃惊的是两个人，一个是主持人，一个是观察团的一个女孩子，她问了一个这样的问题，她说吴大使，如果我们一直和外面经济交流下去，这个和平能维持多久？我一听大吃一惊，按照她的潜台词，好像马上要打仗了。这个我想听听你的评论。第二个，邱震海也到我们这里来过，他反复讲一件事，和平很好，但是可不可以用一种冲突的办法，使对方到谈判桌上来？我对他的想法也感到很奇怪。回到你刚才讲的很多东西当中，我有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你也讲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从现在的历史档案看来，当时没有一个国家想打；现在 30 多年来，也没有一个国家想打，但是会不会由于某种判断，小的事情引发大战，这种可能性有没有？

吴建民：你问了两个问题，一个是辩论当中女孩子问的问题，和邱震海的问题。长期以来，我们青年人的国民教育是欠缺的。邓小平同志的重要思想，我们历次党代会强调时代潮流、时代主题变化，这个教育我认为是欠缺的。过去两年，我到 20 多所大学去讲话，问大学生，你们都说世界变了，最大变化是什么？统领一切的变化是什么？只有个别大学生答对，多数都不对。教育这块我觉得是一个问题。所以包括邱震海、罗援这些人的思想，就是犯了时代错误，天变了，道变了，他们把战争革命时代的天和道，来套今天，你说怎么行呢？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想是这样的，千万不能低估和平发展这个时代的潮流。如果有一天出现这样的事情，会不会动武？即使会，但是我相信也不会打得稀里哗啦，总是马上有人出来调停，要求停火，两头拱，马上出面呼吁，为了人类的利益，坐

下来谈。去年11月9号，我在柏林研讨会上，当年苏联的一个军人在场，他当时负责导弹部队的一个单位，荧光屏上面看到好像是美国导弹打过来了，他完全可以下令，马上打出去。但他判断荧光屏这个情况错的，就没有动。柏林研讨会上，人家很称赞他，说这个军人很了不起。这股大潮流来了之后，即便出现一些出格的事，也不会想一直这么打下去，总会有人尽快出面调停。谁要发疯，要继续打下去的话，就像我刚才那一句话，谁要这么干下去，谁就会被送上人类审判台，人类是不会饶恕他的。

余际庭：吴大使，你是外交家，今天能在这里和你见面，真是非常荣幸。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关于日本对钓鱼岛国有化这个做法，我想日本人会不会并不像表面上讲的那样轻率做出这个决定？日本人这么做的动机，到底是什么？他是不是拿准了中国，他知道美国在旁边，中国不会牺牲发展的机遇，所以就这么做了，这里面肯定有很多非常复杂的原因。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最近孔子学院的事，瑞典说要关掉孔子学院。我们现在都讲软实力，为什么中国人在西方世界里建立软实力这么困难？我们孔子学院的做法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是他们不能接受的？如果说，这作为一个连锁反应，中国政府能否意识到下一步其他国家的一些孔子学院的前景会怎么样？谢谢。

吴建民：关于和日本钓鱼岛的争端，作为一辈子搞外交的人，我回头看这件事情的时候，不能不感到一些遗憾。因为购岛，最早是石原慎太郎在美国的时候提出来的。据说是美国人给他出的点子，他在访问美国的时候提了这个东西。最后，就是按照他这条路子去走了，他不喜欢中日关系好，我们最后就走了这条路了。外交上我认为，可能到一定的时候，需要反思。从日本方面来讲，胡锦涛主席当面跟野田首相讲，说你这样做不行。野田低估了国有化这几个字，在中国人中的理解和日本人的理解是不一样的。野田跟我们解释，如果钓鱼岛让石原慎太郎买过去了，我们就控制不住了，因为按照日本的法律是这样的，如果国家弄过来之后，我能够控制住，他当时是这样解释的。但是这样会带来什么结果，他没有考虑到。所以这个事情呢，我相信若干年之后，人们在回顾这段历史，会分析当时的全过程，哪些方面做得对，哪些方面需要检讨。我写了两本外交案例，我希望有一天，人们可以把外交案例找出来研究学习。不能说任何事情都是中国人百分之百正确，也不能说日本人百分之百正确，我们的每一步是不是都很对，都可以预见这一点，我觉得回过头来，是有反思余地的。

第二个问题，孔子学院的问题，我想不要夸大出现的一点问题。我和施燕华2010年去孔子学院，我们两个人从东海岸到西海岸去了六所大学，我们两个发表演说谈中美关系。就像自由论坛一样，参加的人都是自愿的。到芝加哥大学，他们说今天不能保证有很多人，结果后来走廊上都站满了人，中美关系人家还是感兴趣的。孔子学院发展这么快，什么原因？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因为中国的崛起，人们对中国语言的兴趣上升了，要学中文，孔子学院也适应了这种要求。

法国新任驻华大使说，现在法国好中学的标准是有没有开中文课。我们两个去的时候，站了很多美国人。我们2010年去，正是金融危机比较厉害的时候，他们说现在失业很严重，但是缺少教中文的老师，孔子学院适应了这个问题。第二，对中国文化了解的需要。世界对中国的文化不了解，通过孔子学院，了解中华文化，这个需求当然是中国崛起带来的。我觉得孔子学院适应了这个问题。至于办的过程当中，有些事情值得商榷，我觉得这个都可以考虑。我跟孔子学院提过意见，孔子学院的院长两年一换，三年一换，哪有这样的？我跟歌德学院的总负责人谈过，他说学院的院长，任期起码八年。我们孔子学院两三年，像走马灯一样，哪有什么长期眼光？换一个人，换一个主意。在座的诸位你们比我更清楚，就像今天中国有些地方官换得太勤一样，根本没有长远的眼光。到底怎么办？我认为中国还在摸索的过程当中，人家有些意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否会形成一个大搞孔子学院的潮流，我还看不到这样一个苗头，我是不是看错了，需要将来再看。我的基本估计是，有这两大需求在那里，人家反应也是不错的。有些办的好，有些差一点，但是这个是有需求的。所以总的来讲，我们需要总结经验，包括一些做法，院长的人选，怎么融入当地社会，我认为是存在一些问题的。软实力，说到底人家得喜欢你。人家讨厌你，根本没法提软实力。好莱坞大片，谁强迫你看？我们希望有一天，中国人的东西，人家喜欢。当然这个要克服种种障碍，但是我相信，随着中国的崛起，如果这个势头不中断，这一天会到来的。

缪其浩：吴大使，我想问，对形势安全的担心对我们所造成的冲击。我感觉，30多年来，其实我们外交总的方向没什么变化，但是不时受到各式各样的干扰。最近我感觉到比较明显的，一个是信息安全的冲击，如斯诺登。包括您刚才第一个问题，互联网问题，我觉得和这个是有关系的，这个东西对我们影响很大。你从外交的角度，能不能判断一下，做一个分析，包括内政、外交，该如何恰如其分地把握好？

吴建民：你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对于中国面临的安全形势，究竟做什么样的估计。我的看法是，我们现在面临的安全形势属于一个比较好的时期。最危险的是什么时候？是上世纪60年代，跟苏联闹翻了，跟美国人在越南打仗，那时候最危险。2014年，听一些人讲，中国好像岌岌可危，三大岛链把中国封锁死了，好像不通过战争把钓鱼岛拿回来，中国人就活不下去了。我认为这是错误的估计。我们2013年的外贸总额到了4.2万亿美元，成为全球最大的贸易国家，出境的有1亿人。我参加有些会议，跟那些人讲，当年中国被封锁的时候，这个滋味你们没有尝过，我尝过。1961年，当时上面派我和另外一个同志到塞内加尔去开会，当时还没有建交。驻几内亚的大使说，我见过这个部长，我给他发个电报应该没有问题，电报说中国有两个学生参加这个会议。这个电报不发还好，发了以后，我们两个一到机场，他们一看是中国学生，就不让入境。我们在机场休息室呆了两夜一天，然后坐飞机回去。我是学法语的，1961年年底，巴黎开会，

派我和另外一个同志去，到法国使馆签证，被拒签。我今天和法国人讲这个故事，他们说不好意思，没有想到当年拒签的就是后来的中国驻法国大使。事实是，那时候中国人走不出去。现在有些同志说，我们要为资源而战。我们每年进口两亿八千万吨石油，可以国际市场上买到的，我们一年进口大概八千万吨粮食，也可以买到的，你还需要为资源而战吗？不需要，全球化了，我们在国际市场可以买到的。有些同志为什么还这样想，还处于战争革命时代的观念？他认为中国被封锁死了。其实远远不是这个局面，因为今天中国和世界的利益连在一起。当然，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最坏的情况我们得考虑到，包括马六甲海峡，我们将来要采取一定措施，万一出现什么情况，我们还有一条路，这是必要的，这是另外一种估计。我认为，对安全形势的客观估计非常重要。颜色革命，国际上比较流行的看法，包括我的看法，没有一个成功的。哪一个成功了？为什么不成功？时代过去了。这一点，我们中国人要有信心。索罗斯都承认，他是惯于搞颜色革命的，但是没有一个是成功的。这是时代的问题，也是最大的变化。现在我们中国很少从时代主题变化考虑，小平同志认为时代主题变了，这对中国影响很大。当时准备打仗，沿海不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首先发展这个地方。改革开放前，靠近香港澳门台湾的地方都是前线。改革开放之后，那里成立四个经济特区，前线变成了地利。最大的例子就是 1992 年，小平南巡讲话的时候，苏联垮掉了，东欧发生了剧变，照理说，这是敌人大举进攻的时候，如果思想停留在过去，关上大门固守阵地，那是不行的。所以邓小平说，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中国的大发展证明邓小平的决断是多么的英明。根据是什么？时代变了。我们旧时代的阴影挥之不去。我长期搞国际问题的研究，这个问题也是一个现实，能够一挥就去吗？去不了。在座的诸位，你们都很有知识，我讲的是一家之言，中国现在处在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这次荣华请我来，他请我一定来，我们是好朋友，我很钦佩荣华的人品和他的胆识，他是一位非常优秀的领导。他请我来，我一定得来，讲一些看法，目的是供诸位参考，促进思考，最后正确与否看实践，实践证明对就是对的，实践证明错就是错的。谢谢大家

乔依德：非常感谢吴大使给我们做了一个精彩演讲，虽说是一家之言，这一家也非常重要，我听了受到很多启发。他也指出来，2014 年，其实不止 2014 年，有一段时间，社会上有一些说法，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金融危机以后，对自己看得比较高了，对别人看得比较低，社会上也有一些思潮。我想吴大使从他资深睿智的外交家角度，跟我们讲这些，对我们非常重要。大家再次以热烈的掌声，对他的精彩演讲表示感谢。今天沙龙就到此为止，感谢大家的参加。

（以上内容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